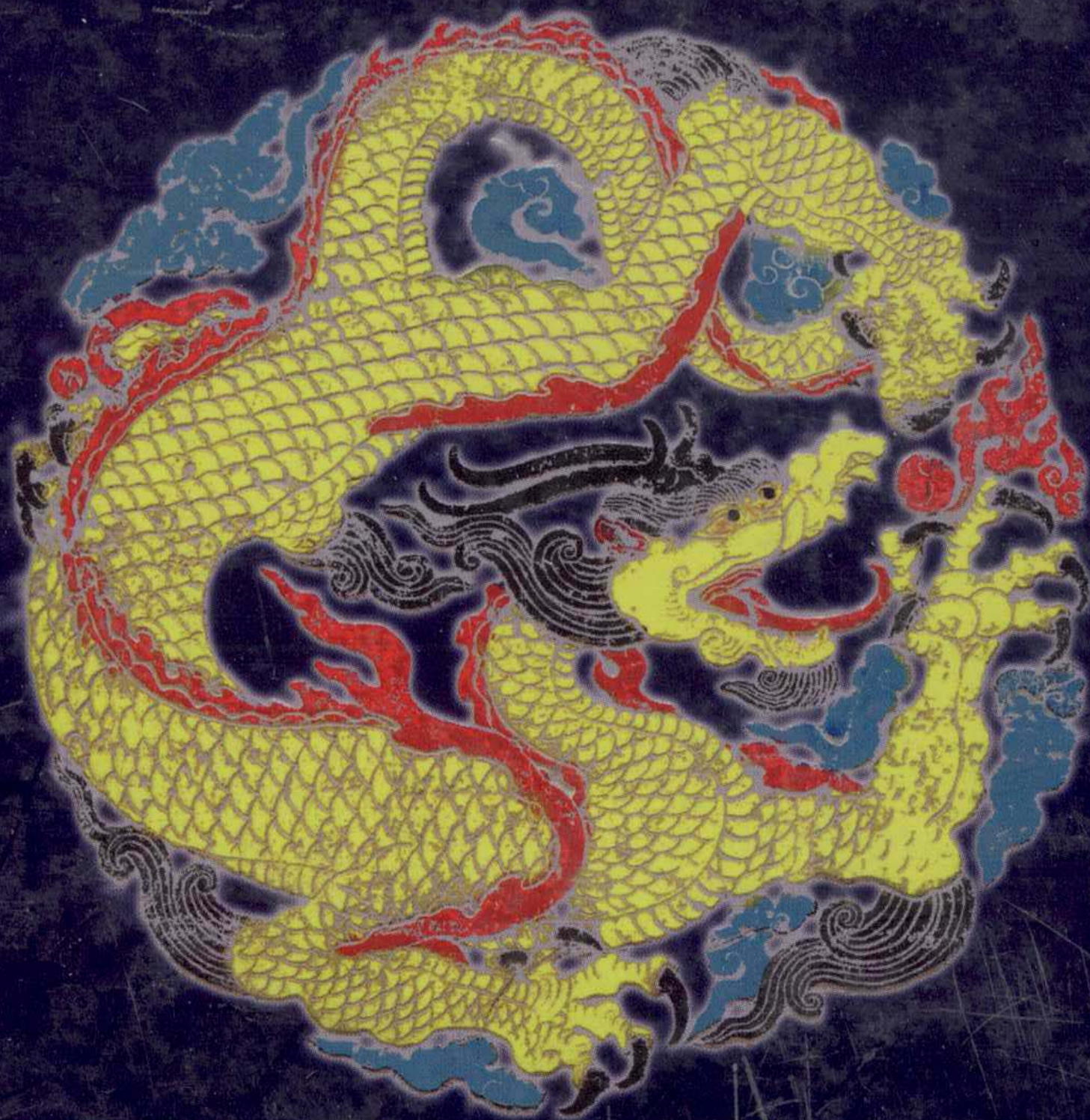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文物与考古系列丛书

金代陵寝宗庙制度史料

宋大川 夏连保 黄秀纯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线编目 (CIP) 数据

金代陵寝宗庙制度史料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402-1567-4

I. 金... II. 北... III. ①陵墓—史料—中国—金代②
寺庙—史料—中国—金代 IV. K878

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3471 号

金代陵寝宗庙制度史料

作者: 宋大川 夏连保 黄秀纯

责任编辑: 杨燕君

装帧设计: 宋大川 王鑫 程利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邮码: 100006

电话传真: 86-10-88552151 (发行部)

86-10-65240430 (总编室)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太原市今天西马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 / 32

字数: 443.74 千字

印张: 8.91

印数: 001—500 册

版次: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1567-4

定价: 84.9 元

燕山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燕山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文物与考古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 任：齐 心 宋大川

副 主 任：郁金诚 赵福生 王清林

委 员：陈 平 靳枫毅 黄秀纯
田敬东 程瑞秀 袁进京
杜和平 王 鑫 朱志刚
周 宇 程 利 董玉刚

本书作者：宋大川 夏连保 黄秀纯

前 言

公元10世纪——14世纪，也就是女真民族形成、发展到金朝的建立和灭亡的前后大约五个世纪时间里，在中国境内，曾先后或同时建立并对峙的有宋、辽、西夏、金、元以及吐蕃、大理等数个王朝或政权，这些先后或同时建立并对峙的王朝或政权，除宋朝而外，其余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或政权。尤其是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它们不仅各自由一个非汉人的统治集团所建立，而且这些少数民族都是当时生活在北方或西北方的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相对于当时的汉民族而言，无论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是文明发展的程度，都是相当落后的。但是，凭借着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一股勃勃蛮气，他们都先后在各自保持自己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占领并控制了曾经由汉人长期统治的广大地区，把数量众多的长期居住在这一地区内的汉人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四个王朝，“每一个政权，都向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秩序观提出了挑战。”（《剑桥中国辽金元史·导言》）

一

中国过去正统的或称之为传统的史学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总是持有汉族正统论的歧见，把这一时期的历史现象甚至视为是

一种历史的倒退。正如德国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和英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在他们所编的《剑桥中国辽金元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或政权，“通常受到传统中国历史学家的消极对待，它们都被视为中国历史大转弯处的阻碍。”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或政权，史料相对较为零乱和缺乏。譬如从辽、金、宋三个王朝立国的时间来看，辽朝为218年，金朝为119年，宋朝为300余年。而在元代同时修编的辽、金、宋三史，《辽史》116卷，《金史》为135卷，《宋史》则长达496卷。辽、金两史加起来的卷数才及宋史的二分之一；三史的篇幅上，《宋史》为813余万字，《辽史》为90万字，《金史》为165万字，辽、金二史加起来的字数不过宋史的三分之一；《宋史》以卷帙浩繁著称，其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仅《食货志》而言，《宋史》就有十四卷，而《辽史》只有两卷，《金史》只有五卷；《礼志》《宋史》有二十八卷，而《辽史》只有六卷，《金史》只有十一卷，从这些数字上我们不难看出史料的悬殊之大。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史学，囿于“正统”观念，对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或王朝持有一定的偏见，如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1264），本着“国亡史作”的惯例，都曾议修辽、金二史，南宋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但由于当时以哪一朝为“正统”，却长期争论不休。在元修辽金宋三史的当时，对这三史的编修主要有两和意见：一种是仿照《晋书》体例，以辽、金作为“载记”附于宋史，另一种是主张仿《南史》和《北史》例，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辽、金为“北史”。这两种

意见无论是哪一种，其实对辽、金两个朝代的“正统”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偏的，两种意见争议不决，以至“六十余年，岁月因循”，一直未能修成。直到元末至正三年(1343)，以脱脱为纂修三史的都总裁，决定三史“各兴正统，各系其年”，三史才得以仓促修成。至于西夏和土蕃、大理国的历史，后世更是没有一部官修的“正史”，令后世治史者不免扼腕。历史的偏见和资料的相对零乱、缺乏，也导致了后世的研究者对辽、金二史探讨的相对不够系统、深入，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讲中国历史的书籍中，对这些王朝或政权的情况或只言片语，或干脆避而不谈，反映了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失衡”现象。所以辽、西夏、金、元、吐蕃及大理等王朝或政权的历史对一般民众来说，更是知之甚少。

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有着自己的轨迹的。历史上的某一个事件的发生，或许多少有它的偶然性的一面，但如果我们把这些历史事件纳入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观察，就不难发现，在公元10世纪——14世纪的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由文明程度比较低的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或政权，深入中国的腹地统治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大多数汉人的现象，却是有它的必然性的。应当说这是一次北方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大冲击，是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包围、入侵的结果。就这一时期的历史现象来看，这种冲突或入侵的结果，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在持续的几个世纪中，一方面汉、契丹、党项、女真以及蒙古等几个民族虽曾对立纷争，但也有着遣使、通贡、互市、联姻等等各种各样方式的频繁交往，经济文化交流并没有因对峙而中断，它们互相学习或吸收彼此的长处，促进自

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由于对峙引起的战争和民族大迁徙，不断地改变着民族分布的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最终由于这种入侵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游牧民族、半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地区民族的大融合，使游牧民族逐渐纳入了中原文明的体系，农耕文明在这种冲突中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展。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不仅对中华民族发展史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

金代是公元10世纪——14世纪中国境内对峙的各封建王朝或政权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由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起来的国家。

“女真”这一名称虽然较晚出现，但女真族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女真这一名称从严格意义上说，应当是一个部落联盟的名称，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同种的民族。考查女真族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女真族的主源是黑水靺鞨，与先秦时的肃慎、汉至晋的挹娄、南北朝时的勿吉、隋至唐初的靺鞨有渊源关系。史书记载其来源，或笼统说女真即隋唐时的靺鞨，或具体指其来源于靺鞨之黑水部，亦称之为黑水靺鞨。如《文献通考》即云“有黑水部，即今女真”。事实上，最初的女真人不仅不包括原靺鞨诸部的粟末、伯咄、安车骨、白山等部的部民，即使黑水靺鞨16部的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四部也不包括在其内，这在史料上是十分清楚的。《金史》认为，靺鞨原七部，至唐初只存在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两部，其

余的“五部无闻”，粟末靺鞨“后为渤海”。黑水靺鞨臣附契丹后虽然易号称为女真，但据《新唐书·渤海传》称，其中的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四部早在渤海国王大武艺(719年——737年在位)、大仁秀(818年——831年在位)“开大境域”后，都成了渤海国的编户。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天显元年契丹阿保机破渤海国后，又把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四部先后西迁南徙。拂涅部多数部民被分散迁到今辽宁新民、开原、康平及辽阳附近，虞娄部所属迁居今辽宁铁岭西南及沈阳地区，越喜部大多被分散在浑江市北和怀德县等地，铁利部少数部民被迁沈阳市西南和西拉木伦河旁。这些西迁南徙的原黑水靺鞨人，在辽代一直被视为渤海人，未被迁走的多数铁利部，直至金初仍以“铁骊”称号活动。所以严格地说来，最初的女真人，也只是原黑水靺鞨中的十二部民。但女真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吸收或同化着他族人，这在史料的记载上也是很清楚的。如《辽史·太宗纪》称，辽天显三年(928年)被迫南迁的部分渤海人，“其民或亡入新罗、女直”。当大批渤海人南迁后，女真人随即进入春故地，与当地“因诏困乏不能迁”的渤海人错居杂处。在有辽一代，这一地区除有一部分以兀惹名号活动的部族外，其它多被契丹人视为女真，这说明这一部分渤海人已经加入了女真族。在阿骨打取得出河店战役胜利后，原在辽朝统治下的“铁骊、兀惹皆叛入女直”(《辽史》卷27《天祚皇帝》一)，此后铁骊、兀惹称号就再未见于史书。接着，渤海人南迁后集中居住的辽东京道南部地区，也很快被女真攻克，在阿骨打“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的思想指导下，他们互通婚，至金世宗以后，史书也没有了渤海人独立活动的记事。显然，原在辽朝统治下的渤海人，大多已被女真同化

了。另外被同化的还有部分契丹人。如《金史》卷133《耶律余覲传》所载，阿骨打将投金的契丹东路都统耶律余覲所“率近傍部族户三千”，“恐在边生变”，下诏将他们迁至“内地”。《金史》卷46《食货志》还称，阿骨打疑已被征服的“山西诸部族”与天祚帝“阴相结诱”，命弟完颜昂与孛堇稍喝等领兵四千，将他们护送至岭东（今张广才岭以东）。大定三年（1163），镇压了移刺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后，下诏将其户分隶猛安谋克（《金史》卷46《世宗上》）。后来世宗又将西北路参加起义的契丹人迁至金上京、济州、利州等地，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元史》卷149《耶律留哥传》），又下令让契丹人与女真人“相为婚姻”，“男婚女聘渐化成俗”，以为“长久之策”。（《金史》卷88《唐括安礼传》）。当然，在金统治的百余年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汉人加入了女真人的行列，逐渐被同化的。如女真贵族多次南征，将俘掠的汉人迁移以“实内地”，强迫他们做奴隶，散居女真人中。这种情况在阿骨打时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三次。一是天辅六年，阿骨打“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二是天辅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同年四月，又“命习古乃、婆卢火护长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此三次共有多少汉人被迁居女真故地，现已无法查明。但《三朝北盟会编》卷98引赵子砥《燕云录》所记，赵氏在金上京所见女真贵族“唤使”的奴隶，“南人居多”，据此可知这一部分人也不在少数。“历史学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简单单位化的倾向是术语的使用。当我们使用契丹、女真、党项或蒙古这些术语时，应当记住每一个术语所指的不是一个纯粹同种的民族，而是一个综合的实体。契丹、女真、党项这

些称呼，实际上是指契丹人、女真人或党项人领导下的那些联盟。这些名称从语言学上说，就是这些联盟内部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团的名称。这些联盟本身都是多种族和多语言的，……女真人同样是这种情况，在他们的联盟中，我们发现除了蒙古人以外，还有其他通古斯部落。……所有这些部落要么是自愿加入占支配地位的部落，要么是通过武力和信仰而被置于他们的首领之下”。（《剑桥中国辽金元史》）这一点我们研究女真族历史的时候应当引起特别的注意。

三

女真一词用于史书的记事，最早见于《辽史》卷一《太祖本纪》唐天复三年（903年）耶律阿保机“伐女直，下之”一语。但女真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最早出现的历史时间，依据《宋会要辑稿》第196册《蕃夷三》所载，是“唐贞观中，靺鞨来朝，中国始闻女真之名”。《文献通考》也有“唐贞观中，靺鞨来朝，太宗问其风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国始闻其名。契丹目之曰虑真”的说法。相同的记载还见于《北风扬沙录》、《大金国志·金国初兴本末》等书。如果这一说法可信无误，那么女真这一名称应当至少在唐贞观中就已经出现了。可是我们查遍唐贞观至唐末二百多年的文献资料，皆未发现这一时期有女真名称的记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部落的名称，在大多数场合下，似乎是偶然发生的。随着时代的进展，往往有这种情形发生：即邻近部落给一个部落起的名字，与该部落自己起的名字不同，如克勒特人给德意志人所取的他们最初的历史

史的总称为日耳曼人一样。”（张仲实译本第87页）根据恩格斯所描述的这一情况，我们推想，或许早在唐贞观中或更早一些时间，女真族对本民族的名称的叫法就已经非常接近当时汉语口语中“女真”一词的读音了，但由于当时这一民族所处的地域与中原相隔甚远，加之当时的交通不便和信息不通等等原因，所以中原人对这一族属的称呼仍沿袭旧称而已。女真一词在女真文中写作“更岑”，读如“诸申”，其读音与史料中对这一族属的不同名称的读音是非常相近的，如肃慎、靺鞨、虑真、朱理真、朱里直、诸申、女直、女质、朱里扯特、主儿扯惕、拙儿擦歹等，如考虑到汉语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读音差别的话，我们也许不难看出中原典籍史料中不同时代对这一族属的不同称呼，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代对“更岑”女真语言的音转。这一点民国时孟森在《清朝前纪》中就已指出：“女真起于辽世，或谓即古肃慎之转音，当可信。”从女真在辽、金、元时代皆称女直，至明代又复旧称为女真，似乎也比较附合这一点。至于《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云“至老主道宗，避宗真庙讳，改曰女直”，（《大金国志·金国初兴本末》及《丛书集成》初编三九零三号本《金志·初兴本末》等史料也都有同样的说法），过去我国学者大都根据这些记载，认为女真之所以又称女直，是辽时为避兴宗宗真的名讳而改的，似乎未见的可靠。

文献资料中最早记载“女真”一词的是《旧五代史》。《旧五代史》一共有五处记载了女真的情况。《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在追述女真先人黑水靺鞨的历史时是这样表述的：“唐贞观中，太宗征高丽，靺鞨佐之……开元中，其酋来朝，拜渤海州刺史，遂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迄唐世朝献不绝。五代时始

称女真。”《松漠纪闻》卷上、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274的注文中也有相同记载，所以“女真”作为一个族的名字比较可信的还是可能出现在五代的时候。

从辽天庆五年(1115年)女真首领阿骨打称帝建立金国，到金天兴三年(1234年)金王朝被蒙宋联军推翻共传九主，前后凡119年。盛时境域东临海，西至今内蒙古包头市西，沿黄河至今陕西佳县，曲折达今兰州市北与蒙古、西夏为邻，南抵淮河、大散关(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北达外兴安岭、库页岛，面积超过了当时主要对峙的宋、西夏两国国土的总和。金朝初建国前，其宗庙、丧葬一依女真风俗，并无制度可言。阿骨打建国后，都于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立国之初“本无宗庙，祭祀亦不修。自平辽之后，所用执政大臣多汉人，往往说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乎建宗庙。若七世之庙未修，四时之祭未举，有天下者何可不念？虏方开悟，遂筑室于内之东南隅，维庙貌、祀事虽具，制度极简略。”“本无山陵。祖宗以来，止卜葬于护国林之东，仪制极草创。”(以上引文皆见于《金虏图经·山陵》)熙宗即位后，始追尊其祖先，追封九代祖为皇帝皇后，并议定谥号，《续通典》卷68《礼二十四》记载：“金熙宗天会十四年八月，文武百僚太师宗磐等上议，追尊九代以下祖考妣曰皇帝、皇后，帝于郊称天以谥。请上皇九代祖谥曰景元，妣曰明懿。八代祖谥曰德，妣曰思。七代祖谥曰安，妣曰节。六代祖谥曰定昭，妣曰恭靖。五代祖谥曰成襄，妣曰威顺。皇高祖谥曰惠桓，妣曰昭肃。曾祖谥曰圣肃，妣曰简翼。曾叔祖谥曰穆简，妣曰静宣。曾叔祖谥曰孝平，妣曰贞惠。皇伯祖谥曰恭简，妣曰妣曰敬僖，须庙室告成，涓日备物，奉上宝册，藏于天府。”又《续文献通考》卷100《王

礼十四》：“《金史·世纪》曰：太宗天会十四年，追谥始祖函普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子乌呼济库，德皇帝，帝子巴哈安皇帝，安帝子绥克，定昭皇帝，庙号献祖。献帝子石鲁，成襄皇帝，庙号昭祖。昭祖子乌库鼐，惠桓皇帝，庙号景祖。十五年，追谥景祖第二子和哩布圣肃皇帝，庙号世祖，第四子颇拉淑穆宪皇帝，号肃宗。第五子盈格孝平皇帝，号穆宗。世祖长子乌雅舒恭简皇帝，号康宗。熙宗皇统四年，先世诸藏皆称陵号，始祖曰光德帝，曰熙，安帝曰建献祖，曰辉，昭祖曰安，景祖曰定，世祖曰永，肃宗曰泰，穆宗曰献，康宗曰乔。五年又各增尊谥焉。”至海陵王即位后，为了统一中国，于贞元元年(1153年)将都城众会宁迁至中都(今北京市)，“迨亮徙燕，遂建巨阙于内城之南、千步廊之东，曰太庙，标名曰衍庆之宫，以奉安太祖旻、太宗晟、德宗宗干亮父。又其东曰元庙，以奉安玄祖尅者、仁祖大圣皇帝杨割。至褒立，迁亮父德宗于外室，复奉安父懿宗宗庙于太庙，其昭穆各有序”。“始有置陵寝意，遂令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围。年余，方得良乡县西五十余里大洪山曰大洪谷曰龙喊峰，冈峦秀拔，林木森密”。(以上引文皆见于《金虏图经·山陵》)并于贞元三年(1155年)三月“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十一月乙巳朔，梓宫发丕承殿。戊申，山陵礼成”。正隆元年七月，又“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金史》卷五《海陵》)至此宗庙、陵寝及丧葬制度始大备。

据《金史·礼志》所载，金世宗时，曾经命官府“参校唐宋帮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参乐，统以宰

相通学术者，于一事之宜适，一物之节文，既上闻而始汇次，至明昌初书成，凡四百余卷，名早《金纂修杂录》凡事物名数，支分派引，珠贯棋布，进然有序，炳然如丹。又图吉、凶二仪：卤簿十三节以备大葬，小卤簿九节以备郊庙。而命尚书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但宣宗南迁后，由于战乱不断，国势日危，“图籍散逸既莫可寻，而其宰相韩企先等之所论列，礼官张暉与其子行简所私著《自公纪》变亡其传。故书之存，仅《集礼》若干卷，其藏史馆者又残缺弗完，姑掇其郊社宗庙诸神祀、朝覲会同等仪而为书，若夫凶礼则略焉。盖自熙宗、海陵、卫绍王之继弑，虽曰‘卤簿下三节以备大葬’其行乎否耶，盖莫得而考也，故宣孝之丧礼存，变不复纪。”可见在编修《金史》的当时，史官既已对其散失的史料感到无法收集，也没有做认真的收集考订工作，而宁肯让凶礼阙而不载，这就从史料上给我们考查金代的宗庙、陵寝及丧葬制度带来了极大的遗憾。

四

自海陵迁都后，于贞元三年“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其后先后将太祖、太宗和始祖以下十帝陵寝由上京迁至房山，又将熙宗“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金史》卷五《海陵》）可知当时在大房山建成了一个包括诸王兆域在内的相当规模的皇家陵区。据清代著名史学家顾炎武考证，认为“按《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十一月乙巳朔，梓宫发丕承殿。戊申，山陵

礼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视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又《太祖纪》：太祖葬睿陵。

《太宗纪》：太宗葬恭陵。《世宗纪》：世宗葬兴陵。《章宗纪》：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纪》：帝被弑，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谥号，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又《海陵纪》：葬于大房山鹿门谷，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纪》：大定二年，改葬于大房山，号景陵。《显宗纪》：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于大房山，章宗即位，号曰裕陵。是则金代之陵自上京而迁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辉、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猷、曰乔、曰睿、曰恭。其崩于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兴、曰道。被弑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谥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弑而降为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则自即位之二年迁于南京，三年五月，中都为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

北京房山金陵陵区，作为皇家的陵寝所在，在当时是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保护工作的。到明代天启时期，由于清师“克取辽阳，故明惑形家之说，谓我朝发祥渤海，气脉相关。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剷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厌胜之术”。（清圣祖仁皇帝《金太祖、世宗陵碑文》）使一代皇家陵寝毁于一旦。清朝入关后，虽曾对金陵进行过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但金陵的面目已非昔日可比。其后又因战乱和各种政治上的原因，金陵迭加摧毁，至“文革”以后，金陵的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名陵的具体位置已不可考。20世纪80年

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金陵做调查时，发现在金陵主陵区内距现存清代大宝顶遗迹前15米处，有一巨形石坑，疑为当时祭祀坑。而当地村民为搞绿化，将此坑作为蓄水池用。其坑西北角已下陷，东北角石壁已开始向内坍塌。急需进行保护。2001年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文物局责成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金陵进行考古调查。本次调查分两步同时进行，即一方面组织专家和考古队伍对金陵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同时，从文献资料上入手，对有关金陵的资料进行全面检索。这本《金代陵寝宗庙制度史料》便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产生的，它是金陵遗址考古调查的组成部分。2001年，金陵遗址研究课题获得北京市政府优秀人才专项基金的资助。2002年，金陵遗址研究课题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被国家文物局列为重要考古发现。

中国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在这本资料汇编的过程中，我们虽然翻检了大量的史料，但由于时间紧迫，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遗漏的资料在所难免。另外，在资料的取舍和体例的安排上我们也深感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处。金陵遗址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之中，金代的宗庙、陵寝制度还有待于深入地研究探讨，还望方家学者不吝指教，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改正和完善。

目 录

前 言	1
-----	---

金 源

一 初兴本末	3
二 初兴风俗	27
三 金国建国前世系	41
四 金国世系图	45
五 金国九主年谱	47

丧 葬

一 上尊谥附追尊、追降、追谥、追封、追册	51
(一) 金建国前诸帝后	51
(二) 金建国后诸帝后	68
(三) 追封诸帝后	106
二 葬仪、葬制	128
三 归葬	150
四 改葬、祔葬、合葬、陪葬	153
五 陪葬山陵	172
六 临哭、临奠	174
七 燎薪	184